

责任分担与利益置换：非对称联盟中从属国与主导国安全保障的互动逻辑^{*}

姜丽媛

内容提要：文章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在非对称联盟中，处于同一联盟体系中的从属国，在面临共同的安全威胁、有相近的安全诉求且均有利益置换意愿的前提下，为何其所获得的安全保障程度呈现明显的差异？文章提出责任分担和利益置换是影响从属国获得安全保障存在差异的关键变量，从属国的责任分担意愿关系到主导国安全保障成本的高低，而从属国利益置换的意愿则对主导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收益构成影响。通过将自变量与因变量分别进行细化分类，考察了当责任分担与利益置换意愿处于不同程度时，安全保障的分布情况，文章指出，当从属国对责任分担并与主导国利益置换的意愿均较高时，可获得主导国较高的安全保障；反之，获得的安全保障程度低。当从属国的责任分担意愿高但与主导国的利益置换意愿低，或从属国的责任分担意愿低但与主导国的利益置换意愿高时，只能获取有限的安全保障。文章考察了特朗普执政后美国—波兰联盟与美国—德国联盟，以及亚太联盟体系中的美国—日本联盟、美国—菲律宾联盟，对这四个案例中从属国获得安全保障的波动和差异情况进行了论证。

关键词：责任分担 利益置换 非对称联盟 安全保障 主导国与从属国

作者简介：姜丽媛，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2020 级博士研究生

^{*} 感谢钟振明教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感谢《当代亚太》编辑部约请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一、问题的提出

乌克兰危机后，将俄罗斯作为日益增长的威胁已是北约体系内的共识。但美国在波兰与德国的军事投入却出现了明显的差异，这一现象在近年尤其突出。一方面，美国与德国关系龃龉不断，美国宣布从德国撤军 1.2 万人；另一方面，美国与波兰的军事合作却持续升温，2020 年 8 月两国签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后，美国向波兰增加驻军 1000 人，同时新设美国陆军第五军前沿指挥部。^① 这一现象在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中也可以发现。近年来，美国对亚太盟国的军事投入存在明显的差异。为制衡中国崛起，美国在日本、韩国增加军事投入，而对与中国存在主权争议的菲律宾却日渐疏离。根据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的威胁平衡理论，即国家间为平衡共同外部威胁而建立联盟，以增强彼此的安全。^② 在盟友面对日益明显的威胁时，联盟伙伴国会增加对盟友的安全保障，以此威慑对手。基于沃尔特的威胁平衡理论，共有威胁是联盟建立和持续的前提，问题在于，当面临共同的外部威胁时，同一联盟体系中不同从属国为何获得安全保障的程度不同？换言之，何以一些从属国获得了主导国较多的安全保障，而其他从属国却没有？

从学理角度出发，面对上述困惑，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同一联盟体系的从属国，在面临共同安全威胁且有相似安全诉求的前提下，为何获得的安全保障会出现差异？本文拟首先回顾国内外关于联盟安全保障问题的既有研究，指出其启发性以及在解释力方面的不足之处。其次提出本文对此问题的分析框架，即通过责任分担与利益置换这两个变量与安全保障的互动作用，来解释非对称联盟中从属国与主导国之间安全保障的互动机理。最后以美国的东西方盟友中对外部威胁认知程度相似和获得安全保障存在较大差异的国家——德国与波兰、日本与菲律宾为例，来验证本文的假设。

① 《波兰与美国签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新华网，2020 年 8 月 16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8/16/c_1126372639.htm。

② 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5 页。

□ 当代亚太

二、对联盟中安全保障分配问题的现有研究

目前在学术界几种理论视角的研究中，均涉及联盟安全保障分配问题，但各个视角关注的侧重点不尽相同，或关注安全保障变化的方向性、或探究联盟安全保障贡献多寡的原因，或研究地缘位置与军事资源投入的相关性，抑或分析为何不同时期安全保障会出现变动。

第一，“自主—安全”视角关注非对称联盟中安全保障变化的方向性，即大国向小国提供安全保障。该理论提出非对称联盟中大国与小国通过某种交换进程，使得小国获得安全保障。不同学者对这一进程的定义不同，或是通过“自主—安全”交易模型，或是通过一种政治利益与安全保障的交易进程。詹姆斯·莫罗（James D. Morrow）提出了经典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autonomy-security trade-off model），即在联盟中，小国通过向大国让步自主权获得安全，这包括小国通过协调自身的内政外交政策、提供军事基地等，此即“以自主换安全”（convert autonomy to security），而大国通过向小国提供安全以获得更大程度的自主，大国与小国都在此过程中获益。^①莫罗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意在解释非对称联盟形成的动因，虽然肯定了非对称联盟中大国为小国提供安全，然而该理论并没有进一步回答大国和小国如何“交易”，以及小国间安全保障出现的差异性问题的，他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更多关注的是，大国和小国通过交换安全和自主来建立联盟这一过程。

与莫罗的分析角度类似，一些国内学者也提出了大国动用某些激励手段，以获得盟友（从属国）在更广泛议题上的支持。例如，刘丰认为，大国为了让盟友采取一致性行动，在处理与盟友的关系时，通常会采取说服、诱导和强迫这三种手段，在此过程中，大国会承诺给予实质性回报，主要包括提供军事援助和出口军事装备等。^②杨原提出了大国与小国间利益交换的互动机制，即小国在政治上支持大国，大国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在此过程中，大国与小国间达成了某种利益交换，小国获得了安全，大国得以在“大

^①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4, 1991, p. 905.

^② 刘丰：《美国的联盟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6期，第96页。

责任分担与利益置换：非对称联盟中从属国与主导国安全保障的互动逻辑 □

国无战争时代”提升国际影响力。^① 黄宇兴提出，“功能分异”是非对称联盟形成的必要条件，大国运用武力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小国则运用其战略资源来影响大国之间的权力投射。^② 可以发现，上述研究都肯定了大国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但这些研究成果注重大国与小国为何“交易”与“交易”的过程，而非如何“交易”，其假设并不能回答在此过程中，何以对不同盟友提供不同程度的安全保障和军事承诺等问题，因此也无法回应为何不同小国（从属国）之间会呈现安全保障的明显差异性特征这一问题。

第二，公共产品视角关注联盟中安全保障贡献多寡的原因。^③ 该理论提出，联盟所提供的安全功能是供所有成员国消费的公共产品，鉴于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在联盟中存在“搭便车”现象，“较大的成员国总是承担了不成比例的负担”，^④ 并且小国在联盟中贡献的资源要少于较大的盟国，这导致了联盟中公共利益——军事安全总是次优的。可以看出，在公共产品理论的假设中，联盟中较大的成员国承担着安全保障供给方的角色，而小国选择“搭便车”，普遍对联盟安全贡献不足。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以北约为例，运用该理论揭示了北约安全保障不足和成员国间负担分担不均的现象。公共产品理论为联盟中大国与小国之间联盟义务和贡献的不平衡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但该理论却对一些新现象解释力有限。譬如，事实表明，相当一部分新北约成员国更加愿意在联盟中承担安全责任，而公共产品理论无法解释波罗的海国家和东欧国家作为北约中的小国，为何近年来在军费开支增加上表现得如此积极？而德国、法国作为北约中的传统大国，缘何却在增加军费开支上步履蹒跚？此外，公共产品理论虽然论证了大国与小国在对联盟公共利益（安全）贡献的多寡，却并未涉及联盟中大国与小国

① 杨原：《武力胁迫还是利益交换——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106~111页；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19页。

② 黄宇兴：《功能分异与联盟形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2期，第101~122页。

③ Mancur Olson and Richard Zeckhauser, “An 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48, No. 3, 1966, pp. 266-279; Harvey Starr, “A Collective Goods Analysis of the Warsaw Pact after Czechoslovak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8, 1974, pp. 521-532; John A. C. Conybeare, “The Portfolio Benefits of Free Riding in Military Allianc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8, No. 3, 1994, pp. 405-419.

④ Mancur Olson and Richard Zeckhauser, “An 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48, No. 3, 1966, pp. 266-279.

□ 当代亚太

是如何在安全保障上互动这一问题。

第三，地缘政治视角关注盟国间地缘位置与军事资源的相关性问题。有学者从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角度来分析盟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差异。若一国之于美国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利益，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力量投射形成重要影响，并且在政治体制上与美国保持较高程度的一致，就会得到美国的高度重视，获得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① 亚历桑德罗·基罗斯·弗洛雷斯 (Alejandro Quiroz Flores) 探究了地理位置毗邻性、联盟成员国与军费开支的关联，他指出，一国的军费开支与其邻国和盟友的军费开支呈正相关，且这种相关性在防御性联盟中更显著。^② 弗洛雷斯的研究肯定了联盟成员国之间军事开支具备相关性，但他并没有深入分析对称性联盟与非对称联盟中成员国间军事开支有何差别，以及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军事资源是以何种方式、如何分配等问题。此外，弗洛雷斯提出的盟友之间军费开始呈正相关的假设，也无法解释为何在北约和亚太联盟中的一些盟国（如日本），不愿追随美国增加其自身国防开支，而始终将军费开支保持在较低水平这一现象。

此外，克伦·亚尔希·米洛 (Keren Yarhi-Milo) 等学者的研究关注不同时期大国对小国的安全保障程度为何会出现变化。他们提出，大国通过武装盟友或结盟来缓解联盟困境，而影响大国对小国安全保障选择变动的因素主要为共有安全利益和伙伴国相对于对手的军事能力，大国通过评估小国与其共同利益程度和小国的军事能力，来决定以何种安全保障支持小国，包括武装盟友、结盟或两者兼具的手段。^③ 若小国自身军事能力较弱且与大国的安全利益高度契合，大国会以向其提供昂贵武器并签署防御协议的方式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作者通过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案例研究发现，若盟友与美国的安全利益和相对军事能力发生变化，美国对其的安全保障选择也会发生相应改变。对于理解不同时期大国在何种条件下为盟友提供不同类型的安全保障，米洛等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他们的研究也存在以下问题。其一，其研究关注重点为大国对小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单向性，没有涉及大国

① 刘丰：《联盟与国际秩序》，载《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3期，第3~19页。

② Alejandro Quiroz Flores, "Alliances as Contiguity in Spatial Models of Military Expenditure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8, Issue 4, 2011, pp. 402-418.

③ Keren Yarhi-Milo et al., "To Arm or to Ally? The Patron's Dilemma and the Strategic Logic of Arms Transfers and Allianc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1, No. 2, 2016, pp. 90-139.

责任分担与利益置换：非对称联盟中从属国与主导国安全保障的互动逻辑 □

与小国间的互动机制；其二，该分析框架探究了同一案例在不同时期安全保障的差异性，其解释变量能否扩展到分析同一时期不同盟国间的安全保障差异，效力存疑。

通过以上回顾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在解答一些经验困惑时解释力有限。虽然目前一些研究成果涉及了从属国如何获得安全承诺的问题，但并没有通过比较分析从属国安全保障的差异性提出解释性框架，更多的是聚焦个别案例，探究其行为动因，也没有提出从属国在获取安全保障的过程中与主导国的互动框架。

笔者认为，非对称联盟中的安全保障问题研究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第一，在非对称联盟中，主导国和从属国权力不对称的特性，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如威胁认知及对彼此关注度的不对称性等，使得主导国拥有更多的主动权，而从属国往往更加恐惧“联盟困境”。基于非对称联盟的这种特性，学术界更多关注主导国如何管控和调整联盟。然而，以从属国的视角观察，从属国的自主意识不可忽视。非对称联盟中处于弱势的从属国如何获取安全这一稀缺资源？面临主导国有限的军事资源，各从属国如何发挥各自的能力性，通过竞争获取安全保障？第二，在美国的北约联盟体系和亚太联盟体系中，众多从属国的安全保障情况存在明显差异，如何理解在同一时期、同一联盟体系中从属国存在安全保障差异这种现象？现有研究中，关于非对称联盟中安全保障的研究聚焦于单组联盟的个案分析，而横向比较分析同一联盟体系中的若干从属国的安全保障缘何不尽相同，对该问题少有研究。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启发性参考，基于现有研究的待完善之处，本文拟分析非对称联盟中从属国与主导国安全保障的互动机制，并比较分析在同一联盟体系中当面临共同外在威胁时，为何从属国获取的安全保障存在差异。

三、非对称联盟中从属国与主导国安全保障的互动逻辑： 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那么，在非对称联盟中，哪些因素造成同处一个联盟体系的从属国，在面对共有威胁且有相似安全诉求时所获得的安全保障出现了明显差异？

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联盟体系中的安全保障呈现新的特征。第一，美

□ 当代亚太

国强调联盟中安全保障的互惠性。特朗普政府开始着重强调盟友要分担美国的全球责任，甚至将联盟责任分担 (burden-sharing) 与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直接挂钩，敦促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增强国防能力，从安全的“消费国”过渡成为安全的“供应国”。第二，美国强调联盟中安全保障的交易性。在美国全球战略收缩的背景下，安全更加突显出其稀缺性的特征，特朗普政府敦促盟友运用自身资源来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提供支持，^① 可以理解为，美国希望盟友通过支持其领导地位来换取自身的安全保障，具体表现在盟国运用经济、政治、外交、国防等手段和资源来支持美国霸权。在此过程中，从属国获得安全保障，而主导国利用从属国的支持以护持霸权。鉴于特朗普时期美国联盟关系中安全保障呈现的新特征，本文拟利用责任分担及利益置换与安全保障的互动框架，解释上述问题。

(一) 核心概念界定与分类

现有关于责任分担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对北约的考察，^② 覆盖联盟集体行动、联盟困境等议题，例如，安德鲁·班尼特 (Andrew Bennett) 等学者运用联盟依赖 (alliance dependence) 的视角，分析了北约国家在面对外部压力和国内约束的情况下，在海湾战争中的责任分担差异。^③ 而对美国在亚太联盟中责任分担的考察，更多的是基于双边联盟结构下，对美日、美韩等双

① 周方银：《有限战略收缩下的联盟关系管理：奥巴马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选择》，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2期，第34页。

② 参见 John R. Oneal,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Burden Sharing in NA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3, 1990, pp. 379-402; Keith Hartley and Todd Sandler, “NATO Burden-Sharing: Past and Futur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6, Issue 6, 1999, pp. 665-680; Songying Fang and Kristopher W. Ramsay, “Outside Options and Burden Sharing in Nonbinding Alliance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63, No. 1, 2010, pp. 188-202; Ellen Hallams and Benjamin Schreer, “Towards a ‘Post-American’ Alliance? NATO Burden-sharing after Liby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8, No. 2, 2012, pp. 313-327; Timo Kivimäki, “Power, Contribution and Dependence in NATO Burden Sharing”, *European Security*, Vol. 28, No. 1, 2019, pp. 66-84; 李晨：《利比亚战争中美国与欧洲军事力量的运用》，载《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1期，第104~124页；宋芳、洪邮生：《特朗普执政以来欧美关系新变化》，载《国际论坛》2019年第5期，第52~70页。

③ Andrew Bennett et al., “Burden-Sharing in the Persian Gulf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1, 1994, pp. 39-75.

责任分担与利益置换：非对称联盟中从属国与主导国安全保障的互动逻辑 □

边联盟关系中的驻军费用分摊的研究，^①当然，也有学者考察了美国的亚太和东亚盟友在联盟军事行动中的责任分工。^②

关于责任分担的含义，目前学界并没有形成具有共识性的明确定义，有学者将其定义为盟国国防开支的分配，^③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军事存在和军事人员的部署以及风险成本。^④赵怀普等认为，责任分担既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的相互贡献，还内含国际威望与声誉的风险共担。^⑤孙茹将分担负担划分为集体防御负担和维稳负担，其中，集体防御负担可用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衡量，而维稳负担可以盟国参与美国发动的军事战争或干涉来衡量。^⑥综合既有关于责任分担的解释，在本文中，责任分担表现为分担联盟成本的意愿，它不仅具有军费分摊等财政导向，也包括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上对联盟集体行动和任务的贡献，具体上，责任分担主要包括国防开支（表现在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驻军费用分摊，以及从属国对主导国发起的联盟行动的贡献这三个维度。

在本文，利益置换的概念是基于联盟市场理论（market theory of military alliances）中系统交易的基础上的。在非对称联盟中，主导国与从属国交换安全保障与其他非军事商品，彼此获得最大化收益。联盟市场理论认为，军事联盟即为持续置换商品和服务的契约，因此，联盟是建立在对各种商品的需求和供应基础上的，供求双方都能在此交换过程中获益。这些商品

① Kent E. Calder, "Beneath the Eagle's Wing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ortheast Asian Burden-Sharing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sian Security*, Vol. 2, No. 3, 2006, pp. 148-173; H. D. P. Envall and Kerri Ng, "The Okinawa 'Effect' in US-Japan Alliance Politics", *Asian Security*, Vol. 11, No. 3, 2015, pp. 225-241; Elena Atanassova-Cornelis and Yoichiro Sato, "The US-Japan Alliance Dilemma in the Asia-Pacific: Changing Rationales and Scope",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54, No. 4, 2019, pp. 78-93.

② Stéfanie von Hlatky and Jessica Trisko Darden, "Cash or Combat? America's Asian Alliances During the War in Afghanistan", *Asian Security*, Vol. 11, No. 1, 2015, pp. 31-51.

③ Mancur Olson and Richard Zeckhauser, "An 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48, No. 3, 1966, pp. 266-279.

④ Keith Hartley and Todd Sandler, "NATO Burden-Sharing: Past and Futur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6, Issue 6, 1999, pp. 665-680; Hirofumi Shimizu and Todd Sandler, "Peacekeeping and Burden-Sharing, 1994-2000",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9, No. 6, 2002, pp. 651-668.

⑤ 赵怀普、韩宝禄日：《美欧防务责任分担矛盾的缘起、发展及影响》，载《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6期，第116~133页。

⑥ 具体定义参见孙茹：《美国联盟与国际秩序变革——以分担负担为例》，载《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2期，第16~17页。

□ 当代亚太

和服务不局限于军事领域，也包括保护承诺、提供军事基地、经济让步、政治支持和外交政策协调等，但在此交换过程中的商品必须包含军事保障。在联盟市场中，军事保障是最重要的商品，越具有军事力量优势的安全供应商，对其他商品的议价能力越高。在国际层面上，这些联盟契约的市场取决于多少国家能提供安全保障。正如金同飞（Tongfi Kim）指出，军事承诺的供求关系和政策让步是理解一国在现有联盟或潜在联盟中议价能力的主要因素。^① 基于上述理论，本文认为，从属国的利益置换意愿对主导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收益构成影响，并将利益置换的概念进一步细化，将其定义为从属国与主导国之间为获取安全保障而采取的一些行为（如政治支持、经济妥协和外交让步等），是盟国间的一种政策协调和战略匹配，在此过程中，从属国获得安全保障，而主导国得以维持领导地位，双方均有获益。在本文的研究中，政治支持主要包括政治价值观的匹配和与主导国战略方向的契合，经济妥协主要包括从属国在经贸谈判和关键议题领域对主导国的让步，外交协调主要指从属国与主导国在外交理念上的契合性和对外行动上的一致性。

为便于研究并使自变量简约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将责任分担与利益置换的程度划分为“高”“低”两个程度，并设定满足过半的衡量条件意愿程度为“高”，反之为“低”（见表1）。

表1 责任分担、利益置换及衡量标准

条件 自变量类型	具体内容		衡量标准	意愿程度		
责任分担	提高国防开支		满足3个条件	高		
	驻军费用分摊		满足2个条件	高		
	联盟集体行动参与度		满足1个条件	低		
利益置换	政治支持	与主导国政治价值观契合	满足3个及以上条件	高		
		与主导国战略方向的匹配				
	经济让步	经贸谈判退让			满足3个以下条件	低
		关键议题妥协				
	外交协调	外交理念契合性				
		对外行动一致性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Tongfi Kim, *The Supply Side of Security, A Market Theory of Military Allia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责任分担与利益置换：非对称联盟中从属国与主导国安全保障的互动逻辑 □

此外，如表 2 所示，本文中的因变量——安全保障——主要包括主导国在从属国境内的军事力量部署、公开发表的对从属国的安全承诺、盟国间的安全协商机制、军事援助和军售、主导国与从属国的军事合作水平^①这五个方面。本文将从属国获取安全保障的程度划分为“高”“低”与“有限”，并设定满足 3 个以上条件时，安全保障程度即为“高”；满足 2 个或 3 个条件时，为“有限”；满足 1 个条件时，为“低”。

表 2 安全保障类型与衡量标准

安全保障类型 \ 条件	具体内容	衡量标准	程度
军事力量部署	从属国境内是否有主导国驻军/军事力量部署的波动情况	满足 5 个条件	高
安全承诺	主导国领导人或军事官员公开发表声明支持从属国	满足 4 个条件	高
军事合作	联合军事演习数量；军事官员的交流互访频率	满足 3 个条件	有限
盟国间安全协商机制	主导国与从属国的安全政策和行动协商制度	满足 2 个条件	有限
军事援助与军售	主导国的军事援助；主导国对从属国军售数量、金额	满足 1 个条件	低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 自变量与因变量互动的因果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在非对称联盟中，主导国是权力关系中的支配方，也是联盟安全保障的供给方，主导国对联盟安全和从属国的安全影响，比从属国对联盟安全和主导国的安全影响更大。受制于自身军事能力较弱，从属国往往需要主导国提供安全保障。但是，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现实表明，在非对称联盟中，并不意味着从属国在联盟安全保障方面是完全被动和无助的。从属国甚至会做出与常规认知相反的举措，来刺激主导国做出更加坚定的安全承诺，抑或寻求自主性，转而以更加自助的姿态发展自身军事实力，以维护自

^① 董柝壮认为，满足以下任一条件即可视为盟国间高水平的军事合作：战时和平时共同的军事指挥、要求成员国执行共同的防御政策、提供给盟国共同使用的军事驻地、成员国军事官员进行官方交流、联盟创立共同的军事组织来协调军事计划和行动、一方为另一方提供军事训练或技术支持、冲突中一方军队置于另一方领导之下。参见董柝壮：《联盟类型、机制设置与联盟可靠性》，载《当代亚太》2014 年第 1 期，第 113 页。

□ 当代亚太

身安全。譬如，20世纪70年代，韩国曾试图独立拥核，虽然在美国的施压下该企图以失败告终，但美国为安抚盟国，对韩国做出了更加坚定的联盟承诺，此后开始向外界承认在韩国境内部署核武器，在韩境内的美国核武器从“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转向了公开化。中苏联盟破裂的历史也表明，若从属国不认可主导国的安全政策，从属国可能主动疏离与主导国的关系，甚至改善与联盟敌对国家的关系来缓解其紧张的安全环境。综上，在非对称联盟中，主导国无疑拥有对联盟安全的主导权，但从属国的行为也可以刺激主导国，使其对安全保障做出改变。

在此，笔者需要简要总结一下责任分担、利益置换与安全保障之间的因果逻辑链条。从属国的责任分担意愿关系到主导国安全保障成本的高低，而从属国利益置换的意愿则对主导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收益构成影响。当从属国愿意分担联盟责任时，主导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成本较低，若此时从属国与主导国进行利益置换的意愿也较高，主导国为从属国提供安全保障就可获得较高的联盟收益，这时主导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成本较低且收益可观，其为从属国提供安全保障程度也较高。反之，当从属国的责任分担和利益置换意愿均较低时，则会造成主导国提供安全保障的联盟成本高而联盟收益低，这将导致主导国在联盟成本和收益的理性权衡下，不愿对从属国提供较程度的安全保障。

（三）研究假设

基于上文对核心概念的界定和因果逻辑的论述，笔者认为，在非对称联盟中，从属国通过在责任分担与利益置换的互动权衡过程中，获取主导国的安全保障。笔者提出以下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1：当从属国承担联盟责任的意愿与进行利益置换的意愿均较高时，主导国会对其投入较高的安全保障。即当从属国愿意分担联盟成本、承担联盟责任，并且与主导国在一些关键的领域达成妥协、对主导国的利益做出让步时，主导国会增加对其的安全保障，加强联盟关系。

假设2：当从属国承担联盟责任的意愿与进行利益置换的意愿均较低时，主导国对其投入较低程度的安全保障。即当从属国不愿意过多地分担联盟成本、承担联盟责任，并且在一些关键领域希望保持自主权，而不愿意对主导国做出让步、妥协时，主导国会疏离与其的关系，减少对其的安全保障。

假设3：当从属国承担联盟责任意愿较低或进行利益置换的意愿较低时，

责任分担与利益置换：非对称联盟中从属国与主导国安全保障的互动逻辑 □

只能获得主导国对其有限的安全保障。

表 3 从属国获取安全保障的程度

责任分担意愿 利益置换意愿	高	低
高	安全保障程度高	有限的安全保障
低	有限的安全保障	安全保障程度低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 3 代表了非对称联盟中从属国从主导国获取安全保障的理想模型，在该表中，根据利益置换意愿与责任承担意愿的互动，产生了关于安全保障的三种程度：高、低与有限。在实际的联盟关系中，安全保障的程度可能呈现更多变体，有限的安全保障可能表现为主导国对安全保障的承诺模糊性、安全保障的不确定性等。

总体来看，主导国在判断从属国责任分担与利益置换意愿的互动过程中，权衡联盟成本与收益，决定提供安全保障的程度。在案例的选择上，本文在美国的北约盟友和亚太联盟体系中，之所以各选择了两个案例（波兰与德国、日本与菲律宾）进行比较分析是由于：首先，要选择具有比较价值的国家。在美国的东西方联盟体系中，本文选择了特朗普时期美国的军事保障投入具有较大差异的国家。其次，为控制变量，选择对外部安全威胁感知相近的国家。乌克兰危机后，北约与俄罗斯关系日趋紧张，但北约内部的威胁感知程度不一。鉴于地缘毗邻性与威胁认知的相关性，^① 与俄罗斯接壤或地缘相近的北约国家，其威胁认知程度明显高于西欧国家。这就排除了加拿大与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而波罗的海国家、德国、波兰等国对俄罗斯的威胁感知程度则相对较高。相较于波罗的海国家，德国和波兰在获得的军事投入对比和国家体量上更具代表性。

在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中，则选择了与中国存在主权争议的国家——日本和菲律宾，这两个国家同时也在获得的军事保障上存在较大差距。下文将运用上述分析框架，来探究美国在北约和亚太联盟体系中，波兰与德国、日本和菲律宾的安全保障差异问题。

^① 沃尔特认为，地缘的毗邻性与综合实力、进攻实力、侵略意图是影响威胁水平的重要因素，参见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第 21~22 页。

□ 当代亚太

四、案例验证

乌克兰危机后，美国的北约盟国德国和波兰都面临着与俄罗斯关系日益紧张的局面，然而，美国在这两个国家的安全保障投入却呈现明显的差异，特朗普政府宣布从德国撤军，降低两国军事合作的强度，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与波兰的军事合作日渐升温。与之类似，美国在亚太联盟体系中，菲律宾和日本都与中国存在领海和海洋权益争端，美日、美菲军事联盟都有着制衡中国的意涵。但在特朗普时期，美国对两国的安全保障投入却相差甚远，一方面，虽然美日关系龃龉不断，但美日联盟保持了基本稳固，军事合作得到深化发展；另一方面，美菲联盟关系却跌入低谷，美国对菲的安全保障极大萎缩。

（一）美波联盟升温与波兰获取安全保障的提升

乌克兰危机以来，面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压力，波兰获得来自美国的安全保障呈逐渐上升的趋势。

首先，波兰分担联盟责任意愿上升，这体现为以下三点：第一，波兰稳步提升国防开支。北约内部军费分摊的矛盾由来已久，在2014年的北约威尔士峰会上，各成员国达成共识，同意至2024年将国防开支增加到GDP的2%。^①然而，2017年，北约内部只有包括美国在内的五个国家达到此标准。^②特朗普执政后，美国与北约成员国间的军费分摊问题再次成为争议的焦点，特朗普敦促各盟国尽快达成国防开支占GDP的2%的承诺，否则将从盟国撤军。^③波兰在北约军费分担问题上表现颇为积极，2015年，波兰议会通过了国防预算，自2016年开始，每年将不少于GDP的2%用于国防开支，

^① Wales Summit Declaration, NATO, September 5, 2014, https://www.nato.int/cps/ic/natohq/official_texts_112964.htm.

^② 依次为美国（3.6%）、希腊（2.4%）、英国（2.1%）、爱沙尼亚（2.1%）和波兰（2%），参见“Defense Expenditures Of NATO Members Visualized”，Forbes, July 10, 2018, <https://www.forbes.com/sites/niallmccarthy/2018/07/10/defense-expenditure-of-nato-members-visualized-infographic/?sh=4ca0637114cf>.

^③ “Trump Warns NATO Allies US Can ‘Do Our Own Thing’ If 2% Spending Goal Not Met-Reports”，Russia Today, July 12, 2018, <https://www.rt.com/news/432886-nato-trump-gdp-spending/>.

责任分担与利益置换：非对称联盟中从属国与主导国安全保障的互动逻辑 □

并将预算的 20% 用于国防现代化建设。^① “波兰一直致力于分担国防开支的负担，以使美国的军事投入更具成本效益。”^② 乌克兰危机后，波兰的国防开支稳固在 GDP 的 2% 左右（见表 4），并计划至 2025 年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 2.5%。^③ 第二，波兰积极分摊美国的驻军费用。2018 年，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Andrzej Duda）访问美国期间，提出波兰愿意斥资 20 亿美元建造“特朗普堡”（Fort Trump）的倡议，邀请美国在波兰建设永久性军事基地，以永久驻军的方式来代替当前美国在波兰的轮换部署。^④ 第三，波兰在参与联盟军事行动上表现积极。自 2017 年，波兰开始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反恐行动，参与对伊拉克特种部队的培训活动。^⑤ 此外，波兰参与了北约在欧洲东翼的“前沿存在”（tailored forward presence）部署计划，向罗马尼亚、拉脱维亚派遣行动小组，增加其军事存在。^⑥

表 4 2015~2021 年波兰国防开支占 GDP 百分比 (%)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
占比	2.22	1.99	1.89	2.02	1.98	2.23	2.22

说明：* 2021 年为预估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北约官网数据整理，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2/6/pdf/220627-def-exp-2022-en.pdf

其次，在其他关键议题上，波兰也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愿意在某些领域做出妥协，或支持美国的相关政策。第一，在这一时期，美波政治理念契合度较高，波兰表达了对美国相关政治决策的支持。在执政理念上，与美国

① “Polish Ministry of Defence: 1.99% GDP to Be Allocated to Defence during the FY2016. More Money for the Army Soon?”, Defence 24, April 18, 2017, <https://defence24.com/polish-ministry-of-defence-199-gdp-to-be-allocated-to-defence-during-the-fy2016-more-money-for-the-army-soon>.

② “Poland Offers US up to \$2B for Permanent Military Base”, Politico, May 27, 2018,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nato-poland-offers-us-up-to-2-billion-for-permanent-american-military-base/>.

③ “Poland: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U.S., June 25, 2019, p. 9.

④ “‘Fort Trump’? Polish President Urges US to Consider Opening Base”, CNN, September 19, 2018, <https://edition.cnn.com/2018/09/18/politics/fort-trump-andrzej-duda-poland/index.html>.

⑤ PMC IRAQ, Website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https://www.gov.pl/web/national-defence/pmc-iraq>.

⑥ PMC Romania, Website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https://www.gov.pl/web/national-defence/pmc-romania>.

□ 当代亚太

相呼应，波兰总统杜达表示，他奉行的是“波兰优先”的外交政策。^① 2018年10月，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退出《中导条约》(INF Treaty)后，与世界主流舆论不尽相同的是，波兰外交部表达了对美国这一决定的支持，认为俄罗斯违反《中导条约》在先，美国的退约行为可以理解。一些波兰官员认为，美国的退约举动可能带来了恢复战略平衡的政治机遇，波兰可以借此邀请美国在其领土部署快速反应部队和导弹威慑俄罗斯，从而在这一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② 此外，波兰也追随了美国在5G问题上的立场，2019年9月，波兰与美国签署了《美国与波兰关于5G的联合声明》(the US-Poland Joint Declaration on 5G)，该文件虽未提及华为等中国企业，但其对供应商的选择标准已明显将中国企业排除在外。

第二，波兰对美国在经济领域的追随集中体现在能源议题上，具体表现为波兰追随美国反对俄罗斯的“北溪2号”天然气项目。在“北溪2号”问题上，波兰是美国坚定的支持者，波兰总理马特乌斯·莫拉维奇(Mateusz Morawiecki)曾建议美国对参与建设“北溪2号”的公司实施制裁。^③ 尽管与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相比，美国的液化天然气项目不具备价格优势，但波兰仍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天然气进口协议。2018年11月，波兰与美国签署了一份为期24年的液化天然气协议，根据该协议，从2023年起，波兰将每年从美国进口200万吨液化天然气。^④ 2019年6月，杜达总统访美期间，再次与美国签署了进口协议，每年额外购买150万吨液化天然气。^⑤

第三，波兰也表现出了与美国协调外交政策的较高意愿，接受并迎合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转型。特朗普执政后，面对美国政府的“美国优先”和单边

① “Why Trump May Want to Watch Poland’s Election?”, Bloomberg, July 9, 2020,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7-10/why-trump-may-want-to-watch-poland-s-election>.

② “Waszczykowski: Wyjście USA z Porozumienia INF to Szansa Dla Polski”, Onet, October 27, 2018, https://wiadomosci.onet.pl/opinie/waszczykowski-wyjscie-usa-z-porozumienia-inf-to-szansa-dla-polski/0v88zel?utm_source=eclr.eu_viasg_wiadomosci&utm_medium=referral&utm_campaign=leo_automatic&srcc=ucs&utm_v=2.

③ “Poland Asks US to Impose Sanctions against Nord Stream 2”, Uawire, January 30, 2018, <https://uawire.org/poland-asks-us-to-impose-sanctions-against-nord-stream-2>.

④ “24 Year’s Worth of LNG Supply Deal between Poland and US”, Poland Daily 24, November 9, 2018, <https://polanddaily24.com/68-24-year39s-worth-of-lng-supply-deal-between-poland-and-us>.

⑤ “PGNiG and Venture Global LNG Agree New Purchase of 1.5 MTPA of LNG”, PR Newswire, June 12, 2019, <https://www.prnewswire.com/in/news-releases/pgnig-and-venture-global-lng-agree-new-purchase-of-1-5-mtpa-of-lng-803106968.html>.

责任分担与利益置换：非对称联盟中从属国与主导国安全保障的互动逻辑 □

主义的外交理念，与法国、德国等其他北约盟友批评美国损害了跨大西洋关系相比，波兰不仅接受了这一既成政治现实，而且还迎合特朗普政府的游戏规则。波兰并没有呼吁特朗普政府重拾多边主义规则，而是倾向于强化与美国的双边关系，通过巩固波美双边关系，提升波兰在北约联盟中的地位，进而寻求在其领土上部署永久性军事基地来获取美国稳定的安全保障。

此外，波兰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协调还表现在国际事务层面，波兰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支持美国利益目标的实现。例如，在中东问题上，此前波兰对该地区并没有表现出过多兴趣，但2019年，波兰与美国共同主办了关于“促进中东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未来”部长级会议，会上讨论了中东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核武器扩散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发布了“华沙进程”（The Warsaw Process）。^①

总体上，在特朗普时期，波兰承担联盟责任态度积极，两国利益置换进程顺畅，美国加大了在波兰军事保障的投入力度（见表5）。第一，美国在波兰增加军事存在。2019年6月，波兰与美国发布了《防务合作联合声明》（Joint Declaration on Defense Cooperation Regarding United States Force Posture in the Republic of Poland），根据协议，美国在波兰新设陆军总部，在波兰轮换驻守的人数将从4500人增加到5500人，而波兰也将承担由此增加的每年约1.2亿欧元的军费开支。^②此外，美国还在波兰新设了陆军第五军前沿指挥部、组建联合作战培训中心（CTC）、空军MQ-9无人机编队、陆军区域支援小组（ASG）、航空卸货港（APOD）等。2020年8月，美国与波兰签署了《增强国防合作协议》（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落实了此前的安全合作协定，为美军常驻波兰建立了法律框架。第二，面对波兰积极分担联盟责任和在各关键领域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维护，特朗普对波兰此举表示赞赏，认为波兰在此问题上起到了领导作用。^③

① Co-chairs' Statement on the Ministerial to Promote a Future of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Middle East, U. S. Embassy & Consulate in Poland, February 14, 2019, https://pl.usembassy.gov/cochairs_statement/.

② “Joint Declaration on Defense Cooperation Regarding United States Force Posture in the Republic of Poland”, White House, June 12, 2019,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joint-declaration-defense-cooperation-regarding-united-states-force-posture-republic-poland/>.

③ “President Trump in Poland”, White House, July 6,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articles/president-trump-poland/>.

□ 当代亚太

2018年9月,在两国关于加强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美国重申了对波兰的安全承诺。^①2019年波兰总统访美期间,美国重申了对波兰《北大西洋公约》中第3条和第5条的联盟承诺。^②第三,在具体的安全合作上,这一时期,波兰与美国的军事合作达到新高度。在波兰启动的“欧洲捍卫者2020”(Defender-Europe 20)军演,是北约25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美国和波兰也开展了旨在增强互操作性和提升能力的双边军演,如空军培训演习、特种部队训练等。第四,美波的安全合作机制更趋紧密。特朗普执政以来,两国元首访问频繁,先后举行了11次会晤。《防务合作联合声明》和《增强国防合作协议》的签署,为美军部署和两国未来军事合作的制度化发展构建了法律条约框架。第五,美波军售和军事援助来往密切。2017~2019年,美国向波兰出口军事装备金额约为11.2亿美元。^③在此期间,美波还签订了一系列军售订单,例如,2018年3月,美波签署了一项价值47.5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合同,此外,波兰还向美国采购了价值4.11亿美元的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HIMARS),用于改善其远程射击能力。^④2020年1月,美国向波兰出售了32架F-35战斗机,并向波兰提供了相关的培训和后勤服务。杜达总统在交接仪式讲话中特别强调,“波兰能够购买这些战机……主要是由于我们是履行北约义务的盟友——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⑤

① “Safeguarding Freedom, Building Prosperity Through United States-Pol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September 18, 2018, <https://www.president.pl/en/news/art,847,safeguarding-freedom-building-prosperity-through-poland-us-strategic-partnership.html>.

② “Joint Declaration on Defense Cooperation Regarding United States Force Posture in the Republic of Poland”, White House, June 12, 2019,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joint-declaration-defense-cooperation-regarding-united-states-force-posture-republic-poland/>.

③ Direct Commercial Sales Authorizations for Fiscal Year (2017-2019),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national-reports/United%20States%20of%20America>.

④ “U. S. to Deliver Missile Shield to Poland, Irritating Putin”, Bloomberg, March 30, 2018, <https://www.bloomberquint.com/politics/poland-signs-4-75-billion-patriot-missile-deal-with-u-s>.

⑤ “Poland-U. S. Cooperation in The Years 2016-2020. Facts and Figures”, The Warsaw Institute Review, June 17, 2020, <https://warsawinstitute.review/news-en/poland-u-s-cooperation-in-the-years-2016-2020-facts-and-figures/>.

责任分担与利益置换：非对称联盟中从属国与主导国安全保障的互动逻辑 □

表 5 特朗普时期美国对波兰安全保障情况

安全保障类型	具体表现
军事力量部署	美国在波兰驻军人数增加；增加在波兰军事存在
安全承诺	美国多次重申对波兰的安全承诺
军事合作	美波军事合作更趋紧密，在多边和双边框架下均得到发展
盟国间安全协商机制	美波安全合作机制化达到新高度
军事援助与军售	美波军售和军事援助来往密切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美德联盟遇冷与对德国有限的安全保障

与波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朗普执政后，美德关系急转直下，美国大幅缩减在德的军事投入。除在北约国防军费分摊问题上，美德存在固有矛盾外，两国在贸易逆差、能源合作、伊朗核问题等方面均存在立场分歧，面对美国的施压，德国拒绝对美做出让步。

首先，在联盟责任分担上，面对美国的强硬施压，虽然德国同意提升国防开支，支持驻德美军，但态度消极。第一，在军费分摊问题上，德国同意将提高国防开支，但其提升速度远落后于其他盟国。在 2017 年 5 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就盟友间的国防开支问题抨击北约盟国，“在 28 个成员国中，有 23 个国家仍未支付应尽份额，这些国家在过去欠下了巨额资金……比例不均的国防开支给美国造成了不公平的国防负担”，^① 他敦促北约盟国立即增加国防开支。特朗普此后威胁称，“若这些国家受到攻击，美国可能不会提供援助”。^② 德国在增加国防开支上表现谨慎，对于美国反复强调的北约成员国 2% 的国防开支分担标准态度比较冷淡，军费开支增长缓慢（见表 6）。时任德国国防部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表示，至 2024 年，德国仅承诺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 1.5%。^③

① “Trump Scolds NATO Allies over Defense Spending”, CNN, May 25, 2017, <https://edition.cnn.com/2017/05/25/politics/trump-nato-financial-payments/index.html>.

② “Trump’s Whiplash NATO Summit”, Politico, July 12, 2018,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trump-threatens-to-pull-out-of-nato/>.

③ “Germany on the Defence over Military Spending Shortfalls”, Euractiv, April 4, 2019,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defence-and-security/news/germany-on-the-defence-over-military-spending-shortfalls/>.

□ 当代亚太

2019年，德国的国防开支占GDP的1.35%，低于北约成员国的平均水平。^①第二，在驻军费用分摊问题上，美国曾指责德国在驻军费用分摊上的金额远低于美国的其他主要盟国，据统计，2020年德国在驻军费用上的支出约为1.18亿美元，而同时期的韩国、日本分别约为9.2亿和19亿美元。^②德国在驻德美军费用分摊上不愿增加分摊数额，认为其对驻德美军的支持并不能简单用驻军费用分摊来衡量，德国修建美军基地的基础设施、为美军提供保障性服务的费用难以用具体数额量化，但这些也可体现为德国对驻德美军的支持。第三，德国对参与联盟集体军事行动的意愿较低，对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参与度有限。如2019年，美国曾要求德国加入英国和法国在波斯湾的军事行动，但德国予以明确回绝。此外，德国还拒绝了美国要求其向叙利亚增加军事存在、派遣地面部队的要求。^③德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德国已经在与“伊斯兰国”的斗争中做出了重大军事贡献。^④

表 6 2015~2021 年德国国防开支占 GDP 百分比 (%)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占比	1.19	1.20	1.23	1.25	1.35	1.53	1.49

说明：* 2021 年为预估数据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北约官网数据整理

其次，美德利益置换协调不畅，德国不愿让步其国家利益而向美国退让。第一，在政治价值观上，美德对立明显。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倾向孤立主义的回归和单边主义的倒退，与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多边合作的德国存在着明显分歧。时任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曾多次批评美国推卸大国责任，损害跨大西洋关系，表示即使特朗普不再连任，美德关

① “The Secretary General’s Annual Report 2019”, NATO, March 19, 2020, 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0/3/pdf_publications/sgar19-en.pdf.

② “Germany Spent Far Less Than Other Major Allies on Cost-sharing for US Bases Last Year”, Stripes, March 12, 2021, <https://www.stripes.com/theaters/europe/germany-spent-far-less-than-other-major-allies-on-cost-sharing-for-us-bases-last-year-1.665518>.

③ “Germany Rebuffs US Call to Send Ground Troops to Syria”, Russia Today, July 8, 2019, <https://www.rt.com/news/463656-germany-syria-us-troops-reject/>.

④ “Syria: Germany Rejects US Demand for Ground Troops”, DW, August 7, 2019, <https://www.dw.com/en/syria-germany-rejects-us-demand-for-ground-troops/a-49512273>.

责任分担与利益置换：非对称联盟中从属国与主导国安全保障的互动逻辑 □

系的修复也需要时日。^① 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的政策转向促使德国开始寻求更加自主的外交政策，默克尔表示，“欧洲人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德国）完全依靠他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② 此外，针对特朗普上台后一系列退约、退群的政治决策，德国也是大加批评，认为美国“是在错误的时间发出错误的信号”。^③

第二，在经贸问题上，美德矛盾凸显。针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德国采取了反制措施。德国长期是全球范围内外贸盈余最大的国家，2019年德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670亿美元，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顺差国。^④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奉行单边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欧盟发起贸易战以平衡美欧贸易赤字。2018年，美国对欧盟的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加25%和10%的关税，打击欧洲政府的“非法补贴”行为。^⑤ 而在美德贸易赤字问题上，特朗普对美国与德国的巨额贸易逆差表示不满，威胁要对德国的汽车制造业征加20%的关税。^⑥ 据估计，这将给德国造成15亿欧元的损失，并从根本上改变德国以出口为导向的汽车制造业格局。^⑦ 面对美国的施压，德国并没有对美国妥协，而是出台了报复性反制措施。2018年6月，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国家联合发布了一份对美国进口产品增收25%关税的商品清

① “Merkel’s Blunt Speech Sparks Fears of Rupture in Transatlantic Pact”, France 24, May 30, 2017, <https://www.france24.com/en/20170529-merkel-comments-fears-fracturing-transatlantic-usa-alliance-trump-eu-brexit>.

② “Angela Merkel: Europe Must Take ‘Our Fate’ into Own Hands”, Politico, May 28, 2017,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angela-merkel-europe-cdu-must-take-its-fate-into-its-own-hands-elections-2017/>.

③ “Kritik an Trumps WHO-Entscheidung’ Das falsche Signal zur falschen Zeit”, Tagesschau, May 30, 2020, <https://www.tagesschau.de/ausland/eu-who-usa-101.html>.

④ “US Trade Deficit by Country, With Current Statistics and Issues”, The Balance, July 26, 2020, <https://www.thebalance.com/trade-deficit-by-county-3306264#citation-16>.

⑤ “Trump Administration Imposes Tariffs on Steel and Aluminum Imports from Europe, Canada, Mexico”, CBS News, May 31, 2018, <https://www.cbsnews.com/news/trump-administration-imposes-tariffs-on-steel-aluminum-imports-from-europe-canada-mexico/>.

⑥ “‘Build Them Here!’ Auto Stocks Tumble after Trump Tweets Threat of 20% Tariff on All European Cars”, Financial Post, June 22, 2018, <https://financialpost.com/transportation/autos/update-1-european-and-u-s-autos-stocks-fall-on-trumps-20-pct-tariff-threat>.

⑦ “Trump won’t Play Ball on Trade, So Europe is Going Straight to China”, CNBC, June 25, 2018, <https://www.cnbc.com/2018/06/25/trade-war-europe-china-work-together-as-us-threatens-with-new-duties.html>.

□ 当代亚太

单，涉及农业和钢铁产品，总价值 28 亿欧元。^①

此外，德国也拒绝就美国敦促的能源问题让步。德国与美国在能源问题上的冲突集中在对俄罗斯“北溪 2 号”项目的制裁上。虽然特朗普政府不断向德国施压，批评德国已被俄罗斯“俘虏”，但德国对于“北溪 2 号”合作依然保持了自主决策。俄罗斯的“北溪 2 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将过境德国，项目建成后，德国将成为欧洲中部天然气供应的枢纽。特朗普警告德国，“如果德国不立即改变立场，将完全依赖于俄罗斯的能源……德国与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合作导致德国已完全被俄罗斯控制和束缚”。^② 2019 年，美国通过了《国防授权法案》，对包括德国、法国在内的参与“北溪 2 号”天然气管道建设的企业实施制裁，要求其立即停止管道铺设。德国对此进行反击称，美国出台的该法案代表了对德国国内事务的干涉，德国不会允许此类事件发生，长臂管辖对德国无效。德国外长也表示，德国不会改变在该项目上的一贯立场。^③

第三，这一时期美德的外交协调性较差。2018 年的 G7 峰会上，由于此前特朗普政府对欧洲和加拿大铝产品征加关税，以及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导致七国未能在气候问题上达成一致，峰会成果寥寥。会后默克尔表示，特朗普的行为令人沮丧。^④ 2020 年，默克尔拒绝出席特朗普邀请其参加的 G7 峰会，两国关系继续走低。在伊朗核问题上，2018 年 5 月，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JCPOA），重启对伊朗制裁，引发舆论哗然，围绕伊朗核问题的局势开始恶化。在美国退约前夕，德国以及英法等国曾与美国进行外交协调，寻求解决该问题的更优路径，但最终协商无果。美国退约后，还呼吁伊核协议的其他签署国退出协议，德国认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是核不扩散外交的

① “Germany and EU Hit Back at Donald Trump’s Trade War”, DW, June 3, 2018, <https://www.dw.com/en/germany-and-eu-hit-back-at-donald-trumps-trade-war-threat/a-42846571>.

② “Angela Merkel Hits Back at Donald Trump at NATO Summit”, The Guardian, July 11,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8/jul/11/nato-summit-donald-trump-says-germany-is-captive-of-russians>.

③ 《德外长：柏林不会改变自己对“北溪-2”项目的立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20 年 12 月 28 日，<http://sputniknews.cn/politics/202012281032796688/>。

④ “Merkel Labels Trump Behavior ‘A Bit Depressing’ As G7 Agreement Lies in Tatters”, Sky News, June 11, 2018, <https://news.sky.com/story/g7-row-emmanuel-macron-attacks-donald-trumps-fits-of-anger-11400497>.

责任分担与利益置换：非对称联盟中从属国与主导国安全保障的互动逻辑 □

里程碑，坚定地维护谈判成果，拒绝了美国的提议。2020年1月，德国与法国、英国外长发布联合声明，重申三国将继续遵守和执行伊核协议。德国谴责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默克尔批评称，美国单方面终止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协议是错误的，此举破坏了国际社会对国际秩序的信心。^①

总的来看，特朗普执政后，德国虽然承诺分担联盟责任，但不愿向美国让步国家利益的立场，导致这一时期美德联盟关系遇冷，美国在德国的军事投入非常有限（见表7）。这表现在：第一，美国缩减驻军规模并计划迁移在德的军事指挥中心。德国拥有美国在欧洲最大的军事基地和最大规模的人员部署，同时也是美军欧洲司令部（EUCOM）和驻欧空军总部的所在地。2020年6月，美国单方面宣布从德国撤军1.2万人，美在德驻军由3.6万人减少至2.4万人。^②同时，根据美军的重新部署规划，美国还计划将欧洲司令部和特种作战指挥部（SOCOM）从德国迁移至比利时，将F-16空军战斗机中队从德国转移至意大利。特朗普表示，美国此举是为了惩罚德国在军费分担方面的“过失”。^③第二，特朗普多次公开质疑北约的联盟价值，扬言将从欧洲撤军。特朗普认为北约已经“过时”，北约内部的军费分担对美国“非常不公平”，并开始调整与俄罗斯的关系。^④然而，鉴于北约在美国联盟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特朗普政府在敦促盟友承担联盟责任的同时，仍适时安抚盟友。2017年6月，特朗普肯定了《北大西洋公约》中第5条对联盟的安全承诺，缓和了上任伊始与盟友的紧张关系。美国宣布从德国撤军后，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马克·埃斯珀（Mark Esper）访问北约，表示美国将就未来的任何军事动向与盟国磋商。^⑤

① “Germany Finally Comes Clean about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JCPOA: No More than Soft Law”, *Germany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Law*, March 24, 2020, <https://gpil.jura.uni-bonn.de/2020/03/germany-finally-comes-clean-about-the-legal-status-of-the-jcpoa-no-more-than-soft-law/>.

② “The United States Announced Its Withdrawal from Germany”, *ABC News*, June 30, 2020, <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us-withdraw-12000-troops-germany/story?id=72051446>.

③ “Donald Trump Confirms US Pulling Some Troops out of ‘Delinquent’ Germany”, *SCMP*, June 16, 2020, <https://www.scmp.com/news/world/europe/article/3089182/donald-trump-confirms-us-pulling-some-troops-out-delinquent>.

④ “Trump’s ‘Obsolete NATO’ Means Europe Paying for US Militarism”, *Russia Today*, February 27, 2017, <https://www.rt.com/op-ed/378755-trumps-obsolete-nato-europe/>.

⑤ “Pentagon Chief Visits Brussels to Reassure NATO over US Plans”, *Aljazeera*, June 26, 2020,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0/6/26/pentagon-chief-visits-brussels-to-reassure-nato-over-us-plans>.

□ 当代亚太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一时期美德关系出现了较大波动，作为北约成员国以及美国的传统盟友，美德在北约框架内的安全合作仍得以平稳运行，包括“欧洲捍卫者 2020”军演、2019 年 4 月的联盟精神 X (Allied SpiritX) 联合军演等；北约框架内的安全协商会议等仍如期举办，如“跨大西洋能力增强和培训计划” (TACET)、四方小组 (Quad) 中的非正式协商等。此外，美国对德军售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在 2017~2019 财年间，美国对德直接商业销售 (DCS) 数额约为 17.4 亿美元。^①

表 7 特朗普时期美国对德国安全保障情况

安全保障类型	具体表现
军事力量部署	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美军人数；计划将欧洲司令部和特种作战指挥部等军事机构迁出德国
安全承诺	特朗普多次以撤军为筹码，要求德国增加军费开支；特朗普声称若德国不分担对国防开支的责任，美国可能不会履行《北大西洋公约》中第 5 条对盟国的安全承诺
军事合作	北约框架内的联合军事演习平稳运行
盟国间安全协商机制	北约框架内的安全协商会议如期举办
军事援助与军售	美德军事装备交易正常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 美日联盟继续强化与对日安全保障的基本稳固

特朗普执政后，美日联盟虽在驻日美军军费分摊、贸易谈判等问题上龃龉不断，但仍保持着联盟关系的基本稳固，美日联盟在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中的基轴地位没有发生改变。

首先，日本在分担联盟责任上态度积极。第一，日本通过提高对驻日美军的支持来强调对美日联盟的贡献。特朗普呼吁重新评估美日之间的国防成本分担问题，认为日本应增加对驻日美军相关费用的分摊份额，与美国共同承担防御责任。2019 年，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 (John Bolton) 在访问日本时提出，日本在新财年预算中应将《特别措施协定》(SMAs) 中

^① 根据 2017~2019 财年的《外国和国际组织直接商业销售授权报告》整理。参见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18-10/us_655_fy2017.pdf;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2/us_655_fy2018without_introduction.pdf;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7/us_655_fy2019_0.pdf。

责任分担与利益置换：非对称联盟中从属国与主导国安全保障的互动逻辑 □

的“关怀预算”提升至每年 80 亿美元，约为往年的 5 倍。^① 面对美国的施压，一方面，日本认为，其不会大幅增加国防费用，美国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并强调日本已经比其他盟国承担了更多的国防开支。^② 另一方面，日本认为其对驻日美军的相关保障性支出可抵消军费分摊。日本通过承担驻日美军重组和推进美军有效驻扎的保障措施的相关费用，来体现对驻日美军的支持。具体来讲，日本承担了一系列美军基地重新部署的开支，包括美国驻冲绳海军陆战队迁往关岛项目（219 亿日元）、普天间空军基地搬迁项目（707 亿日元）、航母空军连队的搬迁项目（600 亿日元）的费用。^③ 此外，为促进驻日美军与当地社区居民的协调，日本还承担了基地周边社区隔音、社区条件改善等开支，确保美军在日的顺利驻扎。第二，日本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联盟行动，分担美国的行动成本。为保障在中东地区航行安全，美国发起了“前哨行动”（Operation Sentinel），在该地区进行巡逻，并敦促盟友加入，承担维护区域安全的责任。在美国的压力下，尽管日本国内民众反对声音强烈，^④ 日本仍向中东派遣了海上自卫队（MSDF）进行情报搜集行动，保障航道运输安全。但值得注意的是，鉴于日本和伊朗的历史友好关系，日本显然不愿激怒伊朗，因此，日本并未加入美国领导的“前哨行动”，而是以独立行动的名义进行巡逻，^⑤ 这也体现了日本在维护本国利益和与美国保持战略匹配之间进行的微妙平衡。美国对日本的支持和行动颇为满意，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称，即使日本不参与美国领导的“前哨行动”，美国

① “Trump Asks Japan to Hike Payments for U. S. Troops to \$ 8 Billion: Foreign Policy”, Georgia Asian Times, November 17, 2019, <https://gasiantimes.com/2019/11/17/trump-asks-japan-to-hike-payments-for-u-s-troops-to-8-billion-foreign-policy/>.

② “Washington Asked Tokyo to Quintuple Payment for U. S. Forces in Japan”, Kyodo News, November 16, 2019, <https://english.kyodonews.net/news/2019/11/c4b0bac082d9-washington-asked-tokyo-to-quintuple-payment-for-us-forces-in-japan.html?phrase=%20Japanese%20officials%20told%20Bolton%20the%20is%20is%20%22unrealistic%22&-words=officials,told,Bolton,unrealistic>.

③ “Defense Programs and Budget of Japan: Overview of FY2019 Budget”, Ministry of Defense, pp. 34-35.

④ “57% Oppose Sending SDF to Middle East Amid Tensions with Iran”, Kyodo News, August 18, 2019, <https://english.kyodonews.net/news/2019/08/8ed5707d8435-urgent-abe-cabinet-support-rate-rises-to-503-from-486-in-july-poll.html>.

⑤ “Japan MSDF Not to Join U. S. Military in Middle East: Abe”, Nippon, February 4, 2020, <https://www.nippon.com/en/news/yjj2020020400626/japan-msdf-not-to-join-u-s-military-in-middle-east-abe.html>.

□ 当代亚太

也会珍视日本在中东地区所做的努力。^①

其次，在美国关切的关键议题上，日本也极力迎合美国的要求。第一，不同于德法等盟国公开批评特朗普政府，日本在“巩固并提升”美日联盟原则的指导下，以维持美日联盟稳定的大局为重，更多地迎合了美国的要求。为应对特朗普执政后美日联盟的不确定性与“特朗普冲击”，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寻求与特朗普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并反复强调美日联盟的历史传统和共同的战略利益。2016年11月，特朗普胜选伊始，安倍打破惯例访问美国，与过渡政府会面。此后，安倍通过开展“高尔夫外交”“相扑外交”等一系列高规格的外交活动，频繁与特朗普接触，巩固美日政治关系。据统计，特朗普执政期间，安倍共与特朗普进行了37次电话会议，14次直接会晤。^②

第二，在经贸问题上，美国强硬施压，日本则隐忍克制，以农业市场的巨大妥协得到了美国不会提高对日本汽车产业关税的承诺。鉴于美日间存在的巨额贸易逆差，^③ 特朗普执政后，着手削减贸易赤字，恢复“贸易平衡”。美日长期的贸易逆差主要来自汽车和零部件领域，2017年赤字额约为535亿美元。^④ 2018年，美国对日本汽车产业发起“232调查”，威胁可能将关税从2.5%提高至25%。^⑤ 为安抚美国，2020年7月，日本宣布以231.1亿美元购买105架F-35战斗机，这也成为有史以来美国对外军售的第二大订单。^⑥ 2019年10月，经过6个月的艰难谈判，美日达成了贸易协定，两国签署了

① “With Iran, North Korea Tensions in Headlines, Japan’s Defense Minister Visits US”, The Diplomat, January 17,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1/with-iran-north-korea-tensions-in-headlines-japans-defense-minister-visits-us/>.

② Paul O’shea and Sebastian Maslow, “‘Making the Alliance Even Greater’: (Mis-) managing U. S.-Japan Relations in the Age of Trump”, *Asian Security*, Vol. 17, No. 2, 2021, p. 200.

③ 2017年美国对日本商品贸易逆差为689亿美元，当年日本是美国的第三大双边贸易逆差国，参见“United States-Japan Trade Agreement (USJTA) Negotiations Summary of Specific Negotiating Objectives”,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December 2018,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2018.12.21_Summary_of_U.S.-Japan_Negotiating_Objectives.pdf.

④ “US-Japan Trade Talks: The Dog that Did Not Bark”, PIIE, April 26, 2018, <https://www.piie.com/blogs/trade-and-investment-policy-watch/us-japan-trade-talks-dog-did-not-bark>.

⑤ “Chairman’s Comment on the U. S. Section 232 National Security Investigation of Imports of Automobiles and Automotive Parts”, Japan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June 7, 2018, <https://www.jama.org/jama-chairman-statement-on-section-232-investigation/>.

⑥ “Over 100 F-35 Fighter Jets to Be Sold to Japan for More than \$23.1 Billion, Pentagon Says”, Sputnik News, October 7, 2020, <https://sputniknews.com/20200710/over-100-f-35-fighter-jets-to-be-sold-to-japan-for-more-than-231-billion-pentagon-says-1079842198.html>.

责任分担与利益置换：非对称联盟中从属国与主导国安全保障的互动逻辑 □

《美日贸易协定》(US-Japan Trade Agreement) 和《美日数字贸易协定》(US-Japan Digital Trade Agreement), 日本在农产品市场准入方面对美国做出巨大让步, 同意向美国开放部分农产品市场, 而美国则有限度地降低了部分制造设备和工业产品的关税。此外, 安倍政府得到了美国的保证, 不会在汽车产业上对日本征加额外关税。特朗普政府“恢复与日本贸易平衡”的政策已初见成效, 据统计, 2020年美日商品贸易逆差相较于2019年收缩了19.9%,^① 日本从美国的第三大贸易赤字来源国降至第七位。^②

第三, 日本保持与美国在外交政策和行动上的协调。在全球事务和地区热点问题上, 日本努力与特朗普政府保持政策一致性, 维护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利益关切, 彰显盟友价值。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后, 美国与伊朗在中东的博弈搅动着地区局势, 2020年年初美国暗杀伊朗最高指挥官与伊朗后续的反击行为, 再次使美伊紧张关系升级。除了一贯支持美国立场外,^③ 日本更加积极地通过外交行动缓解和稳定中东局势, 试图在美国与伊朗之间扮演调解人的角色。2020年1月, 安倍访问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阿曼三国, 希望“通过促进对话、克制和持久的和平外交来缓解紧张局势”。^④

特朗普时期, 安倍政府积极分担联盟责任和一系列的让步举措颇显成效, 美日联盟保持稳固, 美国在日本投入了相当的军事部署(见表8)。这体现在: 第一, 特朗普时期驻日美军的规模保持平稳, 美国在日本部署的军事力量显著提升。美国计划在日本部署尖端武器装备, 如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⑤ 新型反

① 参见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https://ustr.gov/countries-regions/japan-korea-apec/japan#:~:text=The%20U.S.%20goods%20and%20services%20trade%20deficit%20with,totaled%20%2464.1%20billion%3B%20goods%20imports%20totaled%20%24119.5%20billion.>

② “Japan Ranks as 7th-Biggest Country for U. S. Trade Deficit in 2020”, Nippon, February 6, 2021, <https://www.nippon.com/en/news/kd730438430641930240/>.

③ “Japan Backs Restrained U. S. Response to Iranian Missile Strikes, Abe Says”, The Japan Times, January 9, 2020,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0/01/09/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japan-backs-restrained-u-s-response-iranian-missile-strikes-abe/>.

④ “Japan to the Rescue: Can Abe Defuse Tension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Diplomat, January 13,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1/japan-to-the-rescue-can-abe-defuse-tensions-in-the-middle-east/>.

⑤ 2017年, 美国决定在日本部署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2020年, 日本以成本和技术问题为由, 决定停止部署计划。参见“Japan Halts Deployment of U. S.-Made Missile Defense System”, Kyodo News, June 16, 2020, <https://english.kyodonews.net/news/2020/06/c4e83631fd00-urgent-japan-to-halt-process-to-deploy-aegis-ashore-missile-defense-system.html>.

□ 当代亚太

导雷达等装置。第二，美国多次明确表示将保障日本安全。特朗普在上任初期就重申了对日本的安全承诺，并表示《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于钓鱼岛。^① 第三，在安全合作制度层面，美日联盟的安全合作机制继续强化，新的安全合作机制得以建立，包括联盟机制协调框架（ACM）、双边计划机制框架（BPM）。^② 在多边合作层面，则开启了美日韩三边军演、美日印三方峰会、“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等军事合作和对话机制。第四，在具体的安全合作方面，美日开始探索在情报、监测、侦查、网络空间和太空领域的合作，以及联合训练和演习、能力建设等领域合作的深入，双边安全合作领域不断拓宽。^③ 第五，在美国对日本军售方面，长期以来，美国是日本最大的武器进口国，安倍任期内，日本平均每年花费30.8亿美元从美国购买军备。^④ 这一时期日本从美国引进了F-35战机、E-2D空中预警机等先进军备，国防能力显著提高。

表8 特朗普时期美国对日本安全保障情况

安全保障类型	具体表现
军事力量部署	特朗普时期驻日美军人数无大规模波动
安全承诺	2017年与2019年分别发布的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联合声明中，美国重申《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于钓鱼岛
军事合作	双边军事合作密切；多边合作不断拓展
盟国间安全协商机制	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安全协商机制均得到发展
军事援助或军售	美日军事装备交易正常开展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美菲联盟疏离与对菲安全保障的下降

2016年，杜特尔特担任菲律宾总统后，开始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疏远盟国。菲律宾取消了与美国的联合军演和在南海的联合巡逻行动，要求美国特种部队撤离棉兰老岛。2018年12月，菲律宾提出重新审查美菲《共同防

① “Joint Statement from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and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White House, February 10,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joint-statement-president-donald-j-trump-prime-minister-shinzo-abe/>.

② 李泽：《战略行为匹配度与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期，第141页。

③ “Joint Statement of the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August 17, 2017, https://warp.da.ndl.go.jp/info:ndljp/pid/11591426/www.mod.go.jp/e/d_act/us/docs/js20170817_e.pdf.

④ “The U. S. -Japan Allianc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U. S., June 13, 2019, p. 41.

责任分担与利益置换：非对称联盟中从属国与主导国安全保障的互动逻辑 □

御条约》，引发了对美菲不睦的猜测。^① 2020年2月，菲律宾宣布终止《部队访问协议》，美菲关系坠入低谷。^②

首先，菲律宾将关注焦点转移到其内政事务上，不愿过多分担联盟责任。一方面，在联盟责任分担的能力上，由于菲律宾经济欠发达，显然没有能力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无力承担过多的联盟防御成本。因此，菲律宾对美国共同分担防御责任的要求反应消极。另一方面，在联盟责任分担的意愿上，杜特尔特上台后，战略关注重点发生了位移，专注于处理国内事务，将政策重心放在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上，着重解决菲律宾毒品泛滥和恐怖主义等问题，对美国全球事务和地区问题的联盟行动和安排，参与意愿较低。

其次，菲律宾与美国在一些关键议题上分歧明显，菲律宾不愿完全追随美国，美菲利益置换过程遇阻。第一，两国政治关系遇冷。杜特尔特曾表示绝不会在任期内访问美国，面对特朗普数次邀请其访美，杜特尔特均予以拒绝。两国政治关系的疏离致使菲律宾不会给予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以实质性支持。^③ 第二，在经贸关系上，鉴于菲律宾经济体量较小，且在美菲贸易中，美国处于贸易顺差，美菲联盟并不存在尖锐的贸易摩擦。在经济发展问题上，菲律宾寻求与周边国家的多元化合作。譬如，为解决菲国内基础设施资金不足的困境，菲律宾将目光转向中国，寻求中国对菲律宾的援助和投资，为机场、水坝和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寻求资金来源。第三，这一时期美菲联盟外交协调性较差，菲律宾在对外行动中并未盲目跟随美国。例如，在南海问题上，为了避免中美地缘战略竞争引发的东南亚尤其是南海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菲律宾并未跟从美国的南海政策，保持了政策独立性。2018年10月，菲律宾拒绝参与美国在南海和台湾海峡举办的联合军演。^④ 2020年8月，杜特尔特再次表示，菲律宾不会参与其他国家在南海的军事行动。^⑤

① 《菲防长提议重新审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称“不想卷入战争”，环球网，2019年3月5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lKjlrZ>。

② 《菲决定终止〈访问部队协议〉 菲美同盟遭重挫》，新华网，2020年2月12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8325597497990763&wfr=spider&for=pc>。

③ 聂文娟：《美国印太战略的新场域与菲律宾的“静默退出”》，载《南洋问题研究》2020年第2期，第97页。

④ 《菲总统：不会参加美军在南海、台湾海峡的军演》，环球网，2018年10月10日，<https://mil.huanqiu.com/article/9CaKrnlKdsYr>。

⑤ 《菲媒：杜特尔特禁止菲律宾军队参加南海联演》，参考消息，2020年8月5日，<https://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200805/2417516.shtml>。

□ 当代亚太

综上，特朗普时期，美菲联盟关系趋于疏离，与亚太联盟的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保障投入也跌入低谷（见表9）。这表现在：第一，根据菲律宾宪法，外国军事基地、军队不得设在菲境内，因此，菲律宾境内并未有美国永久驻军和军事基地存在，这限制了美菲安全合作向纵深发展，导致美菲联盟凝聚力不及同地区的美日、美韩联盟。在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印太战略”中，相较于美国的其他亚太盟国，菲律宾的对美战略重要性被降低。^① 第二，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具有模糊性。在1951年美国与菲律宾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美国会介入菲律宾的争议海域，将南海的主权争端适用其中，这就给条约的不同解释留下了灰色地带。美国对菲律宾的政策目标是帮助其增强国防能力，使其能在不将美国牵连进南海冲突的前提下制衡中国。美国决策者认为，将《共同防御条约》的保障范围明确到南海主权争端中，可能激发菲律宾对中国的主动挑衅，从而使美国卷入争端，承担道德风险。^② 因此，美国迟迟不愿明确界定《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菲律宾一直对美国的安全承诺可信性存疑，2018年，时任菲律宾国防部部长德尔芬·洛伦扎纳（Delfin Lorenzana）表达了对美菲联盟的忧虑，呼吁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进行审查，并考虑可以予以取消。^③ 为了安抚菲律宾，2019年，蓬佩奥公开澄清，美国根据《共同防御条约》第4条和第5条，菲律宾在南海受到攻击时美国将做出反应，这是美国首次承认《条约》范围覆盖南海。^④ 但美国对菲的承诺依然含混不清，强调《条约》的外交威慑功能而非军事威慑功能。而特朗普则表现平静，“我真的不介意他们（菲律宾）是否愿意这样做，这将节省美国很多钱”。^⑤ 第三，在美菲军事合作层面，特朗普时期，美菲军事合作的深度和范围都呈现收缩的特征，并

① 聂文娟：《美国印太战略的新场域与菲律宾的“静默退出”》，载《南洋问题研究》2020年第2期，第96页。

② Daniel Remler, “Revisiting the U. S. -Philippine Alliance”, *Marcellus Policy Analysis*, Fall 2020, No. 8, p. 6.

③ “Lorenzana to Review Mutual Defense Treaty: ‘Is It Still Relevant to Our Security?’”, Rappler, December 28, 2018, <https://www.rappler.com/nation/219819-lorenzana-to-review-mutual-defense-treaty/>.

④ 《如菲律宾在南海遭攻击美方将提供保护？中方回应》，观察者网，2019年3月1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al/2019_03_01_491984.shtml。

⑤ “There’s Still Life in the U. S. -Philippines Visiting Forces Agreement”, Foreign Affairs, May 1, 202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5/01/duterte-trump-visiting-forces-agreement/>。

责任分担与利益置换：非对称联盟中从属国与主导国安全保障的互动逻辑 □

未得到深化发展。美菲联合军演虽得以保留，但演习的重点从海上防御和领土安全转向非传统安全问题，如人道主义救援、网络安全、反恐和缉毒行动。两国将“肩并肩”军演（shoulder to shoulder）的模拟实战性质转变为人道主义救援等。此外，美菲还取消了海上防御演习，包括两栖登陆演习（Phiblex）与海上合作和战备训练演习（CARAT）等。第四，这一时期美菲的安全协商进程受阻。2020年，菲律宾宣布将终止于1998年签署的《部队访问协议》。《部队访问协议》为美国在菲律宾轮换驻守和联合军演提供了法律依据，废除协议意味着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将逐渐空心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菲律宾国内严峻的反恐形势，^① 这一时期美国对菲的军事援助和军售呈现增长趋势。据统计，2016~2019年间，美国向菲律宾出口的军事装备价值约16亿美元，^② 并且向菲律宾提供了5.5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③

表9 特朗普时期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保障情况

安全保障类型	具体表现
军事力量部署	菲境内无美国常驻军队和军事基地
安全承诺	《共同防御条约》中对美国的安全保障范围界定具有模糊性，特朗普政府对菲安全承诺仅限于外交层面
军事合作	安全演习重点向非军事领域后退；联合军演范围缩减、频率下降
盟国间安全协商机制	特朗普任期内，两国元首未达成互访；美菲安全协商机制面临空心化趋向
军事援助与军售	美菲军售合作与军事援助正常进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结 语

本文研究了在非对称联盟体系中，同处于一个联盟体系中的从属国，在

① 刘若楠：《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合作》，载《南洋问题研究》2020年第2期，第52页。

② 根据2016~2019财年的《外国和国际组织直接商业销售授权报告》（Direct Commercial Sales Authorizations to Foreign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整理，参见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national-reports/United%20States%20of%20America>。

③ “Duterte Admin (Finally) Acknowledges Value of Philippine-US Alliance”，Stratbase ADR Institute, September 19, 2020. <https://adrinstitute.org/2020/09/19/duterte-admin-finally-acknowledges-value-of-philippine-us-alliance/>。

□ 当代亚太

面临共同的安全威胁、有相近的安全诉求且均有利益置换意愿的前提下，为何其所获得的安全保障程度呈现明显差异。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发现，在特朗普时期，对联盟责任的分担意愿与利益置换意愿这两个变量，是影响从属国获取安全保障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因。本文将联盟责任划分为三个维度——国防开支提升、驻军费用分摊以及对联盟集体行动的参与度。从属国为获取安全保障而与主导国进行的利益置换主要包括：政治支持、经济让步和外交协调。因变量——安全保障可以从主导国在从属国驻军的波动情况、安全承诺、具体军事合作、安全协商机制、军售和军事援助这五个方面进行衡量。研究发现，特朗普时期，波兰对承担联盟责任和进行利益置换的态度颇为积极，获得了美国较高的军事资源投入；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德国虽然承诺分担联盟责任，却不愿过多牺牲自身利益对美国让步，因此，这一时期德国获得的安全保障相对有限；在亚太联盟中，日本以维护美日联盟稳固的大局为重，面对美国施压，分担联盟责任、与美国进行互惠性交易的配合度较高，从而获得了美国较高度度的军事投入；而菲律宾却表现出与美国的疏离倾向，因此，这一时期获得的安全保障较低（见表 10、表 11）。

表 10 各国责任分担、利益置换意愿的情况分布

				波兰	德国	日本	菲律宾
各从属国 责任分担 与利益置 换意愿的 分布情况	责任分担	提高国防开支		○	○		
		驻军费用分摊		○	○	○	
		联盟集体行动中分担主导国的负担		○		○	
	责任分担意愿			高	高	高	低
	利益置换	政治支持	与主导国政治价值观契合	○		○	
			与主导国战略方向的匹配	○		○	
		经济让步	经贸谈判妥协			○	
			关键议题协商	○			
		外交协调	外交理念契合性	○		○	
			对外行动一致性	○		○	
利益置换意愿			高	低	高	低	

说明：○表示从属国满足衡量标准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责任分担与利益置换：非对称联盟中从属国与主导国安全保障的互动逻辑 □

表 11 各从属国获得安全保障情况分布

安全保障类型	具体内涵	衡量标准	程度	波兰	德国	日本	菲律宾
军事力量部署	军事力量部署的波动情况	满足 5 个条件	高	○			
安全承诺	主导国领导人或军事官员公开发表声明支持从属国	满足 4 个条件	高	○		○	
具体军事合作	联合军事演习；军事官员的交流互访	满足 3 个条件	有限	○	○	○	
盟国间安全合作机制	主导国与从属国的军事政策和行动合作、协商机制	满足 2 个条件	有限	○	○	○	
军事援助与军售	主导国的军事援助；主导国对从属国军售的数量、金额	满足 1 个条件	低	○	○	○	○
获得安全保障程度				高	有限	高	低

说明：○表示从属国满足衡量标准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就理论价值而言，本文探讨了在同一联盟体系中，从属国获得的安全保障缘何存在差异这一问题。目前，学术界对从属国安全保障相关问题的研究聚焦于单组联盟中安全保障的波动情况，但此研究存在待完善之处。本文针对特朗普政府时期联盟中安全保障的交易性、互惠性特征，指出在责任分担与利益置换这两个自变量交互作用的机制下，从属国与主导国进行互动这一行为可以对安全保障构成影响；在权衡联盟成本和收益的过程中，根据价值判断，主导国决定为从属国提供何种程度的安全保障，为理解非对称联盟中的安全保障机制提供了新维度。

就政策意义而言，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更趋激烈化的背景下，理解美国盟友的行为逻辑，把握美国亚太盟国的战略选择，将有助于中国更好地采取应对措施。拜登政府执政后，重新强调盟友体系的重要性，给予其盟友明确的安全承诺，联盟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未来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局势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亚太联盟中的从属国是否愿意追随美国牵制中国？抑或在变局中追求战略自主性？中国如何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防止未来可能形成的反华制衡联盟，无疑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只是针对特定时期美国联盟体系中从属国的安全保障差异现象的研

□ 当代亚太

究，关于非对称联盟中安全保障问题的研究，仍然需要进一步拓展，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深化该问题的研究：第一，发展更具一般性解释力的理论，来进行从属国获得安全保障的行为逻辑研究。本文将时间限定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在其他历史时期，从属国和主导国的互动逻辑可能发生变化。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从属国做出行为选择？决定从属国获得安全保障成功与否的条件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无疑也具有研究价值。第二，在相继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太战略”后，美国的战略重心点已明显从欧洲转移至亚太地区。在此背景下，美国理应强化与亚太盟友的联盟关系，以此制衡中国。然而，各组亚太双边联盟关系却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相应地从属国所获安全保障也存在较大差异，如美日、美澳联盟不断强化，甚至发展出了“美日印澳”四方合作的小多边安全合作趋势；美韩联盟基本得到巩固；美菲、美泰联盟发展遭遇挫折等。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Sharing Responsibilities and Benefits: The Dynamic Logic of Security Guarantees between Leading and Small States within Asymmetric Alliances

Jiang Liyuan

Abstract: The central question considered in this article is why small states that are members of the same asymmetric alliance, have similar types of security needs and levels of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trade-offs to secure support, receive very different levels of security guarantees when confronted with a common security threat. This article assumes that cost-sharing and the exchange of interests are the key variables determining differences in the security guarantees obtained by small states. The willingness of small states to share the burden has direct implications for the costs that the alliance leader must undertake in providing a security guarantee. Meanwhile, the willingness of a small state to make trade-offs in exchange for security support further impacts cost-benefit considerations of the leading state. By carefully controlling interaction effects between the independent and dependent variables, this article assesses the degree to which cost sharing and interest trade-offs each impact the distribution of security guarantees. Three assumptions are made: (1) when the willingness of a small state to share burdens and make trade-offs are both high, the state can secure a strong security guarantee; (2) in the opposite situation, the state will receive only a minimal guarantee. (3) When small states are willing to share burdens, but not willing to make trade-offs, or when they are not willing to share burdens, but are willing to make trade-offs, they are able to obtain a limited guarantee.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se assumptions looking at four cases: the U. S. -Poland and U. S. -German Alliances follow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the U. S. -Japan and U. S. -Philippines Alliances within the U. S. Asia Pacific Alliance.

Key Words: Burden-Sharing; Interest Exchange; Asymmetric Alliances;

Security Guarantees; Leading and Small States

About the Author: Jiang Liyuan is a PhD Student in the 2020 Class of the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ongji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Identity: Membership Expansion and Developmental Drivers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Chen Xiaoding and Li Shan

Abstract: As it enters its third decade,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has embarked on a new phase of development. The core focus is on how to enhance internal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and strengthen the SCO's competitiveness. Because of pronounced differences i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al status among the SCO's members,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organization to achieve a European Union style of collective identity. The "ASEAN Way" instead offers a better model for the SCO's institutional identity. In terms of four key dimensions of identity: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international, the SCO has already made a certain level of progress in advancing an institutional identity. This is manifested normatively in terms of the concept of the "Shanghai Spirit," and geographically focused on Central and South Asia, and thematically on themes of regional and security issues. The organization follows the "SCO way" of consultation and consensus-based decision-making, thereby providing a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heterogenous regional institutions.

Despite this progress, the SCO is still in the early stages of building its institutional identity and is not yet able to address all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old and new members. Given the serious challenges stemming from global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geo-strategic conflict,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the SCO over the long term is critical. Ke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